Asia Pacific Science Publications Co., Ltd.
亞太科學出版社
APSP

亚太社会科学
ISSN(O) : 3080-2121
ISSN(P) : 3080-2113
2026 年第 5 期

吐蕃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主要路径及其历史影响研究

张晓琳
（香港珠海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中国香港）

版权说明：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吐蕃时期汉藏佛教关系由零散接触发展成制度化的互动。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印度佛教的输入、唐蕃的政治关系或者“顿渐之诤”上，对于交通网络、僧侣译师、经典翻译、写经制度和地方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视不够。本文以吐蕃佛经目录、敦煌写经、僧官材料为依据，从历史场域、传播路径、转译机制、历史影响四个方面来考察。经过研究发现，汉藏佛教交流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入，在政治交通给予空间条件、僧侣译师推动知识流动、翻译和写经完成文本再生产、宗教制度和地方信仰完成社会嵌入的过程中慢慢形成。其深层次的影响就是使吐蕃佛教的知识体系和僧团的秩序趋于规范化，加强了河西—青藏高原之间文化的联系，给后来的汉藏佛教持续互动打下了文献、制度和社会基础。

关键词：吐蕃；汉藏佛教；敦煌；佛典翻译；文化交流

DOI：https://doi.org/10.62177/apss.v2i5.1874

引言

公元 7 到 9 世纪时，吐蕃政权的扩张使得青藏高原、河西走廊和唐朝腹地之间的人流、信息交流变得频繁起来，佛教正好处在这样的空间重组之中。以往关于吐蕃佛教形成的研究大多强调印度佛教的输入，或者围绕赤松德赞时期“顿渐之诤”的论述来说明汉地禅宗在吐蕃的进退。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教派竞争上，就会忽略佛教传播所依靠的交通路线、译经制度、僧侣网络、写经组织和地方社会。吐蕃佛经目录同唐代汉文佛经目录在三藏、大小乘等分类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知识的整理方式也是文化接触的结果。[1] 由此可见，吐蕃时期汉藏佛教关系不能用“汉地输入 – 吐蕃接受”这样的线性框架来概括。中原、河西、敦煌和青藏高原一起形成一个多节点的传播网络，各个地区分别起着交通转运、文本生产、制度调适和信仰实践的作用。

一、汉藏佛教交流展开的历史场域

（一）唐蕃政治互动与交通网络的重组

作者简介：张晓琳（1993.03）汉，天津人，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创意与中文研究。

基金项目：无。

汉藏佛教交流要依靠可持续的交通条件。吐蕃兴起之后，唐蕃之间虽然经常发生战争、边界调整以及政治斗争，但是使节往来、会盟、贸易、人口迁移等并没有中断。由陇右、河西进入青藏高原的路线同时连接中原、吐蕃和南亚。研究认为唐代由内地经吐蕃、泥婆罗到印度的“吐蕃道”是求法僧、弘法僧和官方使节往来的通道，政治交往客观上为宗教人员和文本跨区域移动创造了条件。[2] 交通的意义绝非仅仅是把佛经送到吐蕃。道路把不同的佛教传统放在同一个流动的空间里，从中原出发的僧人可以经吐蕃到达南亚，印度僧人也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到达吐蕃甚至唐地，边地的寺院、驿站、城镇就成了知识交流的现实节点。佛教观念在移动中不断地被翻译、解释、重新分类，传播形态就具有了复合性。

（二）河西—敦煌多语环境与文化接触条件

河西走廊处在中原、青藏高原、西域交通交汇之处，是敦煌的行政中心、商业节点、佛教重镇。吐蕃统治到河西之后，虽然汉地佛教传统没有中断，但是它同藏语行政、僧团和宗教实践发生了叠合。汉、藏等多民族文字并存使用，使得经典、题记、法事以及寺院事务可以被不同的语言群体反复转译。正因为在多语环境中，佛教交流才由偶然的人员往来变成有地方社会基础的持续互动。长安或者逻些不能单方面决定佛教知识的流向，河西和敦煌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筛选、保存和再传播的作用：中原经典和仪轨可以在这里被重新抄写、翻译并传到高原，吐蕃僧团和行政体系的经验又会反过来影响当地的寺院组织。边地不是被动地接受中心文化末端，而是一个多种宗教资源重组的中介空间。

（三）政治波动中的地方节点与多中心格局

政治环境越是不稳定，地方节点保存和转运的功能就越重要。唐蕃战争、边界调整、赞普内政变动都会导致僧侣迁移、寺院资源重组、文本流向改变，但是敦煌等多语地区在政治中心变化的时候仍然可以复制和保存宗教知识。汉藏佛教交流的韧性更多是来自分布式网络，而不是某一个政治中心一直保持一致的推动。唐蕃关系阶段性的紧张并没有使得宗教交通完全停止，反而加强了河西节点作为人员分流、文本保存和知识转移的中间节点的作用。政治中心关系变化会引起僧侣选择路线、寺院获得资源、经卷流传速度的变化，但是不会导致交流网络的消失。敦煌等地既有交通功能又有行政功能和宗教功能，在不同的政治控制之下能够保持抄经、供养和僧侣活动的连续性，使汉地佛教资源和吐蕃制度实践都有了连续的痕迹。

二、吐蕃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主要路径

（一）僧侣与译师的跨区域流动

佛教文化的跨区域传播最终要由具体的人完成。吐蕃时期往来于中原、河西、高原的汉、藏僧侣，既带去了经典，又带去了讲说方式、戒律实践、修持次第和寺院生活经验。观音法门在吐蕃的流传研究显示，唐代汉地特别是敦煌佛教对吐蕃观音信仰的形成起过一定的作用，汉、藏僧人的译经、弘法活动一起促进了相关经典及信仰的传播。[3] 僧侣的移动会带来师徒关系以及修持传统的迁移。讲说方式、戒律实践、仪轨操作等依靠面对面传授，会随着个人或者僧团进入新的地方，在寺院日常生活中被保存下来。因此形成起来的人际关系使得汉藏佛教交流有超越一部经典、一次政治事件的连续性。

（二）佛典翻译、经录分类与知识传递

译师群体把人员流动又发展成一种知识建构。吐蕃创建起比较完备的佛典翻译工程之后，译师所面对的不只是梵藏转换，还有汉文佛典及其术语体系。翻译的关键不是逐字替换，而是在藏语里建立一个稳定的佛教概念术语网。经名、品类、三藏体系、大小乘分类渐渐规范化，吐蕃佛教就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其中一些分类方式与唐代汉文经录的相似之处，也体现出汉藏文化交流已经深入到知识结构的层面。同一个概念进入藏语之后，就会用本土的语义资源来重新界定它；汉文佛典中的一些表达，在敦煌等

地被转译、缩写或者与其他译本互相参照。因此译经不是原文的机械复制，而是制度化的解释实践。它的长期效果就是吐蕃佛教得到比较稳定的经典语言，并且把汉地佛教的一些概念、分类和叙事方式纳入到自身的成长过程中。

（三）写经活动与僧团组织的制度性传播

敦煌在吐蕃统治时期是观察汉藏佛教互动的重要地区。这里原有的成熟的汉地佛教传统，在吐蕃统治之下又形成了汉、藏等多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环境。吐蕃政权在敦煌组织大规模写经，写经生的选拔、经费来源、校勘、执事人员的设置。赵青山认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写经活动的时间很长、参与的人数很多，并且有比较完善的组织制度。[4] 写经由此把佛教交流从少数高僧之间的讨论变成多人合作的文本生产。抄写、校订、翻译、发愿、供养等环节需要不同的身份者不断合作，佛教文本就嵌入到地方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对于汉族写经生来说，吐蕃的政治秩序改变了他们的工作环境，对于藏族僧侣和官员来说，敦煌原有的汉文佛教资源又成了可以利用的知识库。敦煌及其他文献中出现的“天下都僧统”等僧职资料表明，吐蕃有专门统辖佛教事务的高僧。相关研究认为该制度有中原僧官传统的渊源，在吐蕃的政治、寺院经济、高原社会条件下进行改造。[5]

三、交流过程中的选择、转译与本土化

（一）佛教术语的语义调适与知识重构

如果只把经典翻译看作是语言的转换，那么就不能真正理解汉藏佛教交流的深层机理。佛教术语进入藏语之后，必须重新确定语义边界、概念层次以及同已有词汇之间的关系；一旦某一个译名在目录、经卷、讲授中反复出现，它就会成为后来知识生产的标准。吐蕃佛经目录同唐代汉文经录的可比性显示，交流不单是改变“读什么经”，而且是改变“怎样组织佛教知识”。

知识重组是有选择性的。与吐蕃佛教建设需求相衔接的内容，经录分类、观音信仰、修持方法、僧团管理经验等，更易被长期吸纳；完全依靠特定汉语思想语境的表达方式，未必全部移植过来。接受方按照自身的政治结构、宗教传统以及语言习惯来重新编码，从而使交流的结果带有“来源多、结构本土化”的特点。

（二）宗教制度的选择性吸收与组织记忆

佛教在吐蕃由王室信仰扩展为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宗教之后，僧众、寺院、供养、写经和法事都需要稳定的组织形式。僧官制度、写经管理、经目整理，本质上就是宗教知识可以不断再生产的制度支点。吐蕃对于中原经验的吸收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赞普王权和寺院系统的基础上，把可以利用的治理方式纳入其中。天下都僧统等材料表明，宗教组织已经进入到了比较高的行政化、层级化的阶段。

制度化的重要结果就是交流不再依靠少数人的偶然活动。即使某个僧人离去、政治关系发生改变，写经机构、寺院岗位以及已有的文本依然可以保持知识的传递。由此产生的组织记忆使汉藏佛教交流具有了韧性，也解释了为什么战争、边界的变化并没有完全隔断河西和高原之间的宗教往来。

（三）信仰实践的社会化扩散与跨群体共享

敦煌文化互动不是只存在于寺院和官府之间。长期杂居、商业往来、官府任职和人口迁徙，使得不同的语言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有高频次的接触。同一部经典可以被不同的语言群体抄写，同一个信仰在汉、藏信众中也会有不同的解释。观音信仰之所以能跨族群传播，是因为它的传播不是靠某一部经卷，而是通过造像、发愿、讲经、个人修行等许多种实践的叠加来完成的。

从传播机制来说，吐蕃时期汉藏佛教交流具有“多中心协同”的特点。长安、河西、敦煌和青藏高原并不是严格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政治中心提供制度和资源，

河西交通带保证人员和经卷的流通，敦煌完成多语文本的生产以及地方转译，高原寺院把经典、仪轨和僧团秩序再嵌入到当地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由于各个节点可以互相替代、互相补充，所以交流就不会因为局部的战争或者政治上的变动而完全中断。写经制度以及僧官材料所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个网络结构由临时性接触向稳定运行转变的过程。

四、吐蕃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影响

（一）推动吐蕃佛教知识体系与宗教秩序规范化

吐蕃佛教渐渐形成起比较完备的经典、术语以及僧团系统，同诸多来源的佛教资源相融合有关联。汉地佛教给人们提供的不是一套可以套用的现成体系，而是一套可供选择的文化资源，即经录分类、经典译本、礼仪实践、僧官制度、信仰实践等。吐蕃借助翻译规范、目录整理、寺院组织、僧团管理等手段，把印度佛教传统以及本土社会条件同它们结合起来，慢慢塑造起自身的知识秩序。早期藏传佛教就具有明显的跨文化生成特点。这使得宗教知识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佛典不再只是少数僧人的私藏或者口授内容，而是可以被分类、校订、复制、传授的制度化的文本；僧侣身份以及宗教事务也被纳入到组织秩序当中。知识规范化和制度规范化互相促进，给吐蕃佛教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重塑河西—青藏高原的区域文化联系

敦煌具有特殊的含义，它把中原佛教资源同吐蕃的政治、语言以及僧团网络联系在一起。大量的抄经、翻译活动使得佛教文本在不同的地方不断流动，边地不再是中央文化的末端，而是文化再生产的节点。河西与青藏高原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依靠寺院、译师、写经机构、使节往来、民间交流形成的文物流通空间。即使吐蕃政权后来出现分裂，这些文献、术语、修持传统也会在地方社会中流传下去。从区域史的角度来说，它消解了用政治边界来划分文化空间的弊端。战争可以改变行政归属，但是很难同时切断语言、宗教和社会关系。因此佛教成了河西和高原之间比较稳定的文化纽带，使各地在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之后仍然保持着彼此可以识别的象征体系和知识传统。

（三）为后世汉藏佛教互动积累制度与文献资源

吐蕃时期形成的译经规范、经目分类、僧团管理、多语文本实践等，对后来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宋元以后汉藏佛教再次频繁接触的时候，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在早期翻译传统和区域交流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敦煌保存下来的大量汉、藏文资料尤其珍贵，它使后人可以观察到不同的佛教传统在历史现场中是如何磨合的，从而证明汉藏佛教关系的长期主线并不是简单的“输入—接受”，而是不断进行互译、选择和再组织的过程。吐蕃时期形成的多语佛教实践，也改变了各个群体认识彼此的方式。翻译活动需要译者在词义、教义和修持经验三者之间不断协调，把“他者”的宗教知识逐渐变成可以讨论、比较、使用的共同资源。对于普通的信徒而言，经典诵持、观音信仰、写经发愿等实践把语言边界降到了最低点，使得跨族群交往依靠共同的宗教活动不断展开。

结语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形成了可以继承的跨文化交流方式，语言上的差异可以用译师群体来处理，制度上的差异可以用选择性改造来协调，地方社会可以将外来宗教资源变成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验，所以汉藏佛教关系在以后的历史阶段中又会再次产生联系并持续发展。

吐蕃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是空间网络、知识生产、制度调适、地方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唐蕃交通、河西走廊为持续接触提供了地理条件，僧侣、译师把人员流动变成思想传播，经典翻译、经录分类、写经制度又使佛教知识有了可复制、可传授的稳定形态；进入地方社会以后，观音信仰、写经发愿、寺院

生活等实践又进一步弱化了语言、族群之间的界限。由此形成起来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影响，而是一个由“多源输入、选择吸收、制度重组、社会嵌入”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它的意义不单是汉地佛教因素进入吐蕃，更是交流使吐蕃佛教知识秩序和组织方式趋于成熟，也使河西与青藏高原之间形成比较稳定的文化联系。就长时段来说，吐蕃时期应该被看作是汉藏佛教持续互动结构形成的阶段，而不是后世交流的附属性前史。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王黎 . 从吐蕃佛经目录分类看汉藏文化交流 [J]. 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1,36(3):37–44.

[2] 张云 , 张钦 . 唐代内地经吐蕃道与印度的佛教文化交流 [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1):24–30+137.

[3] 徐东明 . 从观音法门在吐蕃的传播看汉藏佛教的交流和互动 [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39(2):82–88+156.

[4] 赵青山 .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J]. 西藏研究 ,2009(3):45–52.

[5] 陆离 . 日本杏雨书屋藏 737 号吐蕃天下都僧统愿文研究——兼谈吐蕃僧官制度 [J]. 西藏研究 , 2021(4):16–23.